



山东抗战那些人那些事

请讲

日本侵华“腰斩”济南工商业

□徐畅
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

近代济南不仅为山东工商业要埠，还是华北乃至全国的工商业重镇。上世纪20年代济南新式工业资本居全国城市第8位，商办工业资本居第7位。据1933年调查，济南现代工业172家，涵盖25个行业，仅以机器为动力的产业工人就达1.5万人。一些企业

发展势头良好，可谓欣欣向荣。随着日军侵华，繁荣的济南工商业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，于此略述一二，以窥其一斑。

首先，日军以“军管”或“中日合营”等形式肆意掠夺。1938年2月，日军宣布对成丰面粉厂“军管”后，原有股东靠边站，日方只留用职工7人，工人71人，其余均予遣散。据成丰估算，其间盈余至少179万元，日方仅给

5.67万元即作了结。从“军管”到“合办”，抗战8年成丰总损失至少190余万元。

其次，在日军物资控制和经济统制下，原本兴旺发达的工商百业萧条至极。济南本为金融业重镇，“七七事变”时共有银钱行号52家，1939年仅剩26家，资本不足伪官商合办鲁兴银行的四分之一。又如成大纱厂1944年被日军运走8000多枚纱锭，拆毁纱锭1万余枚，机器

被破坏得残缺不全，1300余间厂房屋舍倒塌大半，破乱不堪。日军投降前夕，厂内仅有资金8.4万元伪币，次棉8万余斤，粗劣棉纱17件，负债2400余万元，职工生活苦不堪言，难得一饱。再如振业火柴公司1944年产量仅1.23万件，只相当于1913年的0.5%。

最后，千方百计打击不甘心与日军合作的企业家。日军侵占济南不久就召集工商界头

面人物集会，成立伪济南市商会，一些不愿与日军合作的企业家备受打击。1943年复聚长粮栈王冠东被日军以“暴利罪”逮捕入狱。

尽管如此，日军却打着“大东亚共荣”、“中日提携”等美妙动人的欺骗口号，声称“发展”济南工商业。这种最大限度控制掠夺资源为侵华战争服务的强盗行径，恐怕他们也不相信自编的谎言。

(上接B01版)

济南沦陷 逃到哪里都难有安乐

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夫人“南迁”途经济南，“一到济南，风声甚紧，形势大变，商店闭门，哄传‘日本鬼子就要来，我们都要逃走啦’！大批人争着逃难，谁也不知走向何处是好。”

害怕、恐慌一直持续。1937年12月13日，天寒地冻中又从南方传来噩耗：南京沦陷！

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北面传来的炮火声，头顶上也时有日本飞机掠过。济南城里的百姓们知道，黄河彼岸的日军距离济南越来越近了。

1937年12月的济南，街头巷尾都在喊：“日本人来了！日本人来了……”看着满街惶恐的神色，雍延珍也怕了。

“小乱入城，大乱返乡”，雍延珍的父母带着孩子们奔往火车站，打算返回平度老家避难。

1937年的济南，有两个南北相邻两三百米的火车站，津浦线车站在北，胶济线车站在南。津浦线车站于1912年建成，是少有的日耳曼风格建筑群落。如果不是在1992年被拆掉，这里将会是济南一处经典景观。

火车站一片混乱。身材瘦小的雍延珍被父母硬拽进火车站。火车靠站后，站台上的人一拥而上，周围顿时一片拥挤。

夜色里，除了站台，两条钢轨伸向漆黑的远方。能扒上火车的人，即使是仅抓着火车厢外面的铁杆而身体悬空在车厢外，也不愿再蹲在这寒风凛冽的站台上，望眼欲穿地等着下一趟火车。

逃难，似乎从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，就在中华大地上如潮水般开始。

“七七事变”后直至当年11月，坐镇济南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第三集团军一直在鲁北与日军鏖战，伤亡惨重。

对茫茫众生来说，国破伴随而来的总是家亡。

韩复榘的儿子韩子华在回忆录中提到，自抗日以来，父子便未再相见，直至次年1月24日韩复榘被杀。

“七七事变”前，济南有40多万人口，随着时局越来越乱，人们逃避一空，只余1万多人。

1937年11月15日，韩复榘为阻止日军南下，将黄河铁桥炸断。当天，暂居济南的老舍也同时选择了抛家舍子，独自南下，与胡絮青舒乙母子一别就是六年。

社会学家孙本文曾估计，抗战期间，“高级知识分子90%以上西迁，中级知识分子50%以上西迁，低级知识分子30%以上西迁。”

看着站在中厅的小儿子，老掌柜张启垣抿了口茶水，说：“你是学生，没有什么谋生的本事，就留在家里吧。”

张家决定留守济南，“南迁”的计划也随之搁置。1937年底济南沦陷至1945年抗战胜利，东元盛始终拒绝与日本人合作。

多年后，“张家老大”张伯萱的儿子、今年81岁的张盛昆回忆起这段往事，似乎明白了祖父留下三叔的用意：不管世道多乱，一家人都要守在一起。

日本兵来了

雍延珍一家还算平安地回到了平度，而留在济南的东元盛张家则没有这么幸运。

据史料记载，黄河大桥被炸毁后，日军顺着黄河下游迂回攻击。1937年12月23日，日军在济阳、青城间渡过黄河。24日，韩复榘率10万大军不战而逃。

日军渡河后便迂回包抄济南，12月27日清晨，日军侵占济南。

当天，天蒙蒙亮，在济南北园卞庄附近的东元盛染厂，老掌柜张启垣一早起床，前一晚黄河北的炮声隐隐响起，却听不见南岸还击的炮声。

大概是工人们刚开工不久，厂房外一阵喧闹，甚至还传来开枪的声音。老掌柜赶紧差人去看，“外面怎么回事？”

工人们还没来得及出去，厂房大门已经被撞开。一队日本兵端着步枪，冲着门口的工人就是一枪托，打得工人头上直冒血。

日本兵把厂房围住，老掌柜和工人们也不敢对着日本兵“硬来”，只能赶紧打电话联系家里，向之前有生意往来的日本朋友打探一下怎么办。

不久后，闯进染厂的日本兵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接着就撤了兵。

在1988年出版的《济南工商史料》一书中，济南面粉“大鳄”苗兰亭口述了当时的遭遇：“城内、商埠周围浓烟滚滚。日军进入济南城时，骑在马上顾盼自若，缓步行进，如入无人之境的得意神气。”

在日军攻入济南前一天，韩复榘将城内外省政府、民政厅、财政厅、教育厅、建设厅、济南市政府等行政机关以及商埠的棉布打包厂、各粮行仓库等地一律点火焚烧。

放火烧掉任何可资敌用的财物、设备和房屋，达到以空间换时间，这是蒋介石的“焦土抗战”政策。

济南城的商户多半都不开门营业，除了怕人抢劫，还怕日军强行取用。因为各食品商店均关门停业，日本兵砸了泰康食品公司和上海食物公司，又砸了一些点铺。

被砸的商户纷纷找商会请求保障。日军也找商会，责承供应。时任商会会长的辛铸九不愿为虎作伥，躲在济南洪家楼天主教堂不露面。不到半年，日军又派人劝说辛铸九接任省长，辛铸九均以年老多病为由拒绝。

1939年正月初十晚九点，辛铸九被“请进”日军宪兵队。宪兵队说他“通匪”，摔到地上暴打，随后不是审问就是吊打，遭受了37天的残酷折磨。后经朋友奔走营救，花费5000多元，总算魔窟逃生。

日军宪兵队释放辛铸九时提出条件：为他们做事。辛铸九只应允出来后办慈善、搞教育，几经斡旋后，他担任省图书馆馆长和红十字会统长、赈济会长。利用职务作掩护，多次秘密接待安全转移来自根据地的中共人员，又购买聊城“海源阁”藏书3万2千余册，当然，这是后话。

飘摇的商埠区

雍延珍一家返回平度后，在济南铁路大厂工作的父亲终日气愤不已，痛恨“小日本让我丢了工作，让我举家逃难”。

两年后，父亲在郁郁寡欢中病逝。

1940年，雍延珍独自一人从平度回到了济南。在她的眼里，日统区的济南还是平静的。

马三立的《艺海漂萍录》对1942年的济南有很简短的描述：“泉城风物好，不过究竟是沦陷期间，市面上虽然过往行人也熙熙攘攘，但是大明湖上携酒载歌的却不多。”

无论如何，远离了中日军队交战区，普通百姓的生活依旧得继续。

济南沦陷，作为山东民族资本家的中心，就这样风雨飘摇着。

济南沦陷的第二天，日本特务机关长中野亲自到商会，召集成记面粉厂和成大纱厂的苗兰亭、成丰面粉厂的苗星垣等十余人，宣布“对各厂实施军管”。

日本宪兵队特务也放风说：“苗家对于日军不利，问题很多，其他一些绅商也有不利日军之处，所有有关人员都将依次抓捕，苗兰亭首居要冲……”

当时，苗兰亭非常恐慌，整天提心吊胆。一天，日本宪兵队到成大纱厂进行检



日军行进在济南估衣市街(今共青团路)，济南从此开始八年梦魇。



津浦线(上)和胶济线的济南火车站相邻两三百米。



韩复榘以“焦土抗战”名义烧毁省政府。(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片)

知乎

山东问题的由来

山东问题一直存在于中日之间。一战后，日本乘德国忙于欧战，夺取胶州湾。1914年日本以对德宣战为借口，出兵山东，强占胶济铁路和青岛。1915年，日本为使得利益合法化，向袁世凯递交“二十一条”，要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。5月，中日签订《中日民四条约》，其中关于山东问题的文件有《关于山东省之条约》、《关于山东省事项之换文》等。

中国代表团希望通过巴黎和会收回青岛，废除《民四条约》，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。熟悉国际法的顾维钧从法律上驳斥日本对胶州湾等山东权益的主张，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。最终，英、法、美三国在不考虑中国利益的情况下，把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让给日本。

中国并未放弃对胶州湾等山东权益的主张，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，中国代表提出山东问题，在英美建议下，山东问题由中日在会外交涉解决，英美派代表列席中日之间的交涉。1922年2月中日两国签署《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》及《附约》，规定胶州湾租借地由中国收回，胶济铁路由中国赎回。

1922年，日本将青岛一切行政权移交中国。山东其他地方的日占权益也得到部分收回。1923年，中国以4000万日元赎回胶济铁路及支线并一切附属财产。但日本在山东仍保留许多经济和政治特权，这种特权给近代山东带来无尽的灾难。

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整理